

推薦序一

翻轉「核心」與「邊緣」

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絲路上的帝國》，是一部以長時段史觀寫成，而具有高度原創性的中央歐亞史著作。本書以歷史時期的中央歐亞為出發，進而觀照古今的歷史觀點，頗富有挑戰性與思辨性，對於開闊台灣乃至於華文世界讀者的歷史思維以及人文視野而言，具有相當意義。以下分別就作者的學術背景以及本書的寫作主旨進行扼要簡介，以期讓讀者能夠更加貼近中央歐亞史的研究脈絡，進而培養以獨立思考能力評價本書及其徵引文獻的能力。

本書作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現任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中央歐亞研究系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古代中央歐亞史以及歷史語言學學者，曾獲得有天才獎之稱的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等學術榮譽。白桂思的研究領域十分廣博，對上古乃至中古的中央歐亞乃至於東亞歷史以及語言，均有相關著述。其中部分著作已透過翻譯引介至華文世界，除本書外尚有《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英文原題：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付建河譯，二〇一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發行），而該本吐蕃史專書也正是白

桂思早期的代表之作。

白桂思多年來雖將治學範疇拓展至吐火羅、高句麗等各種古語文之歷史，然究其學術根基，實淵源自歐美東方學研究脈絡下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白桂思在德裔藏學家霍夫曼（Helmut Hoffmann）的指導下，以「關於前帝國時期西藏之早期中古藏文、拉丁文以及漢文史料研究」（A Study of the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atin, and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 on Pre-imperial Tibet）為博士論文題目，取得印第安那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從其學術師承以及博士論文寫作而言，白桂思早期的學術歷程與強調語文方法的德國東方學以及藏學研究，關係密切。然而與一般鑽研語文學學者不同的是，白桂思並不只是專攻個別中央歐亞語文的歷史文本，而往往更加傾向透過還原、構擬古代語言作為基礎線索，進一步就中央歐亞的整體脈絡開展宏觀的歷史敘事，而本書即為一顯著的實例。

在著述之外，白桂思多年來執教印第安那大學，培養出一批學有所長的中央歐亞研究者，其中不乏出身台灣者，如曾任原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並任教於政治大學民族系的張駿逸教授，以及原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教於該校史學系的林冠群教授等台灣藏學研究專家，皆是白桂思的高足，對於中央歐亞研究在台灣學界以及高等教育界的發展均有卓越貢獻，由此可見白桂思與台灣學界的淵源。此次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可以視為白桂思與台灣讀者們進一步的廣泛交流。

作為一位中央歐亞史的研究者，筆者多年來因研究、教學以及會議等各種學術機緣，閱讀白桂思的著作，深受啟發。因此請允許我以「過來人」的身分，向本書讀者，尤其是尚不熟悉中央歐亞史的朋友們，提供三點思考問題，作為閱讀本書前的思想熱身。

首先，該如何定義並理解作為本書關鍵詞的「絲路」、「帝國」乃至於「中央歐亞」等概念？

在概念意義上，本書所定義的「中央歐亞」大致涵蓋「絲路」的範圍。所謂的中央歐亞，即是被歐洲、中東、南亞、東亞等傳統定居文明所包圍的廣大區域，其具體範圍又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而有所浮動，並非一成不變；而作者所定義的絲路，並非一般華文世界所理解溝通中國與歐洲的亞交通網，而是用來指涉不同族群在中央歐亞地區所共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系統。又對於華文世界的讀者而言，「帝國」的意象經常是以「大一統」的秦漢帝國為認知基礎，然而就本書所研究的中央歐亞史而言，「帝國」的本質往往強調多元文化、族群以及語文的交流。

其次，本書主要的寫作目的與史學觀點為何？本書並不是一本為了向讀者娓娓介紹歷史事件、人物、年代等歷史事實的傳統通史或者教科書。作者的主要目的，在於試圖透過重構中央歐亞文明與週邊地區的脈動，來闡發他對世界史以及歷史書寫的整體觀點。白桂思在本書中最高為核心的觀點，主要是以中央歐亞的視野出發，重新反思古今的歷史書寫，最終達成翻轉「核心」與「邊緣」的權力敘事。更具體的來說，毗鄰古代中央歐亞的中原王朝乃至希臘羅馬等定居文明所形成的傳統歷史書寫中，中央歐亞的多元族群往往被籠統地歸結為好戰、貪婪、貧困的游牧野蠻人；然而根據白桂思以及其他學者的考察，這些傳統史學對中央歐亞的描述更像是一種帶有文化偏見的歷史建構而非確切可靠的歷史事實。換句話說，中央歐亞並不完全是游牧社會，也有不少定居的商業城市以及聚落；另一方面，中央歐亞的游牧社會所積累的豐富文化與經濟資產，並不亞於周邊定居的農業文明。要言之，東西方傳統史學中強調善惡褒貶的二元框架，無法充分詮釋中央歐亞的多元本質。

最後，讀者應以何種態度看待作者的論點？對此讀者不妨將本書的歷史觀點乃至於古語構擬，以開放心態視為作者的一家之言，而非教條式的準則答案。如白桂思在反思古代歷史書寫的同時，亦強烈批判現代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史學對中央歐亞乃至世界文明的衝擊，破壞了古典文明對藝

術、宗教、哲學等超越性追求，作者的傾向在第十一章至十三章中尤其顯著，以上觀點至今頗具爭議。此外，本書書末豐富的附錄與注釋，展現出白桂思博學的古語構擬學力，在令一般讀者不明就裡的同時，這些充滿爭議的非凡論斷也並非被學界完全接受。因此與其全盤接受作者的結論，不如嘗試以開放心態與獨立思辨審視本書，如此一來，相信定能透過閱讀本書，享受一場精彩跌宕且翻轉思維的中央歐亞歷史之旅。